

高教动态

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7年第5期（总第275期）

目 录

一、上交大教授深度解密 SCI 到 CSSCI

二、学术训练有多狠？相互尖锐批评就是学者们合作的方式

三、游泳不只是游泳，体育不只是体育

一、上交大教授深度解密 SCI 到 CSSCI

《自然》在国内的神话地位

《自然》杂志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不仅是大家的普遍印象，在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支撑。比如，十年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在中国科学院和某些高校可以得到 25 万到 30 万元人民币的高额奖励。

能够获得神话般的学术地位，首先和它非常善于营销有关。1990 年代，它就有先见之明地在中国科技界内大力营销，会给你送杂志，往你邮箱里定期送中文摘要。它成功建构出神话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具有高影响因子。

以 2016 年数据为例，全世界收入的 SCI 期刊一共 8778 种，《自然》名列第 9 名。排名前 20 名杂志里大部分是专业杂志，而《自然》是综合性杂志，位居第九，很多人就有理由把它说成世界顶级杂志。相比而言，中国现在办的英文杂志中，影响因子成绩最高的才 14，而《自然》是 38，以前曾到 41。

再以大家都知道的韩春雨事件为例，此事虽然尚未尘埃落定，但一开始大家基本相信他在《自然·生物技术》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他发明新的基因剪辑方式的论文。《自然·生物技术》在 2016 年的影响因子是 43，它是《自然》杂志的子刊。论文刊发后，韩春雨在中国国内获得了巨大的科学声誉，由副教授身份当选了省科协副主席。在上海，这样的职位一般都是院士之类的资深专家担任；他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河北省更向他许诺了 2 亿元的巨额研究资金。后来因为国内外许多团队都无法重复他的实验，人们开始质疑，但已经足见高影响因子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韩春雨事件是一个双重例子，一方面表明了论文发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能获殊荣，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单靠影响因子判断一篇论文也可能会失误。刊发了错误的论文，在《自然》这类杂志看来，事情很简单，可以宣布撤销论文。这和中国学界的思维完全不同，它们不会认为是名誉受损的严重事件。比如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造假的物理学家被揭露后，《自然》杂志撤文 7 篇，《科学》杂志撤文 9 篇；前几年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受宠于《自然》杂志时，

一期就刊发她两篇文章，后来她被指控造假，《自然》杂志就将她的论文撤销了事。

影响因子游戏秘诀

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影响因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发布机构是一家私人商业公司

首先，发布影响因子的机构是一家私人商业机构，名叫“科学情报研究所”。很多人都误认为它是国际著名情报机构，而美国法律允许一个纯粹的私人商业公司注册这样的名字，但在中国是不被允许这样注册的。

公司创始人加菲尔德是位商业奇才。图情专业出生的他在读博期间就创立了小公司，出售图书情报信息产品。1960年，他决定把公司更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一下子就红火了。他向人介绍成功经验时说，这个名字，尤其会让第三世界国家误以为是一个国营的非营利机构。所以加菲尔德非常准确地揣摩了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包括中国。

公司每年发布 SCI 报告，报告迄今为止已经收录了全世界 8778 种科学杂志，统计了这些杂志文章被期刊引用的数据；他再把引用的数据开发成衍生产品，叫做 JCR 报告，就是这些刊物的影响因子排名，他每年要发布这些并卖钱。作为商人，加菲尔德所做之事从道德上来说无可厚非，商业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不幸的是我们对他所做的这套商业体系顶礼膜拜，并误认为是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

“科学情报研究所”已被转卖三次

崇拜影响因子的人由此说我想黑他，私营企业就一定不公正吗？

作为私人企业，它有辉煌的业绩。1960年，将公司更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简称 ISI；

1964年，开始出版 SCI 报告；

1973年，推出了 SSCI 报告，即社会科学的 SCI 报告；中国国内有 CSSCI，就是模仿 SSCI，只是针对中文杂志；

1975年，正式开始出版 JCR 报告，影响因子游戏从此开始。

至今为止，加菲尔德的公司其实已经被卖了三次。

第一次，1988年，向JPT公司出售了50%以上的股权(1964年他还向华尔街风投出售过20%的股权)；

第二次，1992年，汤森路透收购了JPT公司，就是冲着旗下的ISI；

第三次，2016年，又转卖给一家加拿大公司。

作为一家私人企业，被卖来卖去很正常，但这怎么可能是国内许多人想象的“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呢？

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与《自然》心照不宣

ISI出版SCI报告已经盈利，衍生产品JCR报告发起的影响因子游戏，让公司更挣钱。本质上说，这个游戏并不是加菲尔德发明，在他之前就存在这种思路了。比如，在每年订杂志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图书馆如何选择？选择文章被引用率高的杂志，就能够满足更多的读者。加菲尔德发扬了这种思想，他可以依据SCI的数据库算出每本杂志的影响因子。那几年，加菲尔德到处去参加学术会议、作报告、提交论文，并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多次刊文，极力鼓吹影响因子。

最初学术界也有人对此有异议，但那两家杂志“有立场”而不刊发反对意见。

杂志当然可以有立场。但还有一个事实，加菲尔德修改过了影响因子公式后，《自然》和《科学》杂志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了，有一个杂志一下子升高了100名。而且这些杂志按照修改公式所体现的“精神”，来改进自己的编辑策略，让杂志影响因子更高。

因此，从1975年影响因子游戏正式开始时，我们有理由认为，ISI公司和《自然》杂志之间，有着心照不宣的共谋。

影响因子公式中的分子如何加大、分母如何减小

在我们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前，国内科学界、图书情报界和媒体普遍将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理解错了。准确的影响因子公式是这样的：

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这个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这

个期刊在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数，就是这个期刊在这个年度的影响因子数值。

期刊的文章被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叫做引用项，一种叫做非引用项，两个加在一起构成了“源刊文本”数，中国人普遍误认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项，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就涉及我们对这些杂志的了解，像《自然》《科学》《柳叶刀》(2016年影响因子排第4位)这些杂志，典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它们都是两栖杂志——既有学术文本，又有非学术文本。学术文本往往只占文章总篇数的10%左右。学术文章对应引用项，其他那些都是非引用项，以《自然》杂志为例，目前通常有18个栏目，只有3个栏目是属于引用项，即学术文本。还有15个栏目里面都是非引用项。而中国学术界和媒体普遍想当然地认为“源刊文本”就等于引用项。

要提高影响因子数值，一是扩大分子，二是减小分母。分子由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构成，分母却是由所有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数构成，让学术文本在总文章数中占的比例变小，分母就变小了。这个公式给这些杂志“指明了办刊方向”：一方面设法让自己的杂志名头大起来，就会有更多引用；另外越少学术文章数，分母就会越小。我们做了细致的数据统计，从1975年以来，《自然》杂志减少了五成的学术文章，《柳叶刀》的学术文章数甚至只剩原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了。而且，杂志还可以在刊登稿件时向高引作者和高引主题的论文倾斜，这样影响因子就可以更高。

这个游戏就这样玩开了。

《自然》无匿名评审制度，从不设编委会，并非学术公器

但这样做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杂志不能是学术公器。

国内学术刊物通常被大家认为应该是学术公器，比如高校或学会的学报，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设有编委会，二是实行匿名审稿制。通常，学报会将稿件送交一个或两个匿名审稿人审阅，来决定是否发表该文；如果一人同意，一人否决，则会提交第三人再审。每期稿件在刊登杂志之前均会召开编委会，

由各个编委对每篇文章进行详细讨论。对于有争议的文章，一般会事先指定某个编委负责细审，并且作出判断。在这样的刊物中，主编只有一票，根据全体编委的投票决定文章是否发表。因此，文章是否发表，理论上是由编委会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审稿人决定。但无论如何，都不是由主编决定的，这就叫做学术公器。

反观《自然》杂志，被我们顶礼膜拜了那么多年，却非学术公器。现任《自然》杂志主编坎贝尔在 2014 年接受国内果壳网采访时说，“我们从来不设编委会”。他还以此为荣，因为在他看来，设置编委会就会使杂志失去独立性。他还强调，《自然》杂志的编辑非常优秀，足以决定文章是否刊登。另外，他还非常明确地表示，《自然》集团旗下的所有杂志均是如此。而在目前影响因子位列前 20 的杂志中，有 9 个杂志属于《自然》集团，它们均不设编委会，所以根本不是学术公器。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在《自然》杂志上发文章那么难，为什么还不公正？我回答说，发文难与公正是两回事，不能划等号。

影响因子存在可以讨价还价等系列弊端

影响因子还可以讨价还价，尽管 JCR 报告每年都重复刊登影响因子公式，但却并不说明分母的计算原则。所以很多杂志都和汤森路透或 ISI 讨价还价，意图提高影响因子。

例如《柳叶刀》杂志，1999 年它的影响因子跌落了许多，就去找汤森路透理论，称其多算了影响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后汤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数值，此后《柳叶刀》大量减少学术文本(从 2000 年的 821 项减到 2014 年的 271 项)，很快使影响因子大幅回升。

又如《美国国家图书馆·医学》杂志，认为汤森路透把它的影响因子计算得过小，自己计算结果为 11，而汤森路透计算的结果为 3，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第二年《医学》杂志的影响因子变成了 8，但“公司拒绝把挑选‘引用项’的过程公诸于众”。

影响因子游戏还存在更多的问题。例如，已经有欧美学者做过研究，证明两年期限明显不合理，不同杂志统一使用两年期限也不合理。但这一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ISI 现在仍然坚持以两年为界。

另一问题是，能不能花钱进 ISI 的收录名单？加菲尔德也说过，收录一本杂志意味着要录入这本杂志的数据，这是有成本的，让杂志自己承担这项成本就能尽快收录，而这就难免使人产生“花钱买进 ISI 收录名单”的猜疑。实际上到底能不能花钱买进收录名单，还没有人公布过调查，而且如果真想花钱买进去，可以通过订阅该公司的产品给它送钱。

影响因子不仅在中国受到崇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受到崇拜，结果是损害了这些国家自己的杂志，所以也有发展中国家尝试进行过反抗，不幸的是以失败告终。

中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困境

从加菲尔德发起影响因子游戏之后，很快在欧美也得到了响应，《自然》《科学》这些杂志的鼓吹起到了很大作用。到上世纪 90 年代，这个游戏已经非常风靡，也开始被中国引进。客观地说，它确实提供了论文评价和管理的简单工具，但到了今天，已产生严重弊端。

权威时代的一言九鼎与“后权威时代”的量化指标

中国学术界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可称为权威时代。权威时代的特征，是由国内一些学术界的泰斗级人物来出具权威意见，他们的意见毫无争议。举非常有名的例子，在何其芳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时，他指定钱锺书担任研究员，某人担任副研究员，某人担任助理研究员，大家对此均无异议，因为何其芳极具权威，而钱锺书也确实很出色。权威时代表面上看似乎某些学术泰斗可以一手遮天，但同时也可以追责。如果钱锺书不称职，大家可以追责指定他的何其芳。所以，即便是学术泰斗也并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需要承担责任。

进入“后权威时代”，没有了权威，学者们互相谁也不服，就需要设计一个“客观”的评价体系。量化指标就显得比较“公正”。于是乎，我们现在看到，评选教授是一个学术委员会共同投票的过程，此时，通过计算论文的数量、发表论文的刊物高影响因子的大小、文章引用情况等等评价标准，觉得再客

观不过了，后果是没有任何人需要对结果负责。

这种“客观”的量化指标，具体到某一篇文章就容易产生荒谬的结果。比如你今天发表了一篇荒谬的文章，人们纷纷给予驳斥，驳斥就要引用，由于影响因子中的引用是绝对数值，无论引用的作用是批判还是赞同，均计入引用次数。所以那些被撤销的论文，在撤销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

简单管理工具的弊端：国内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

就管理的便利而言，有些人挺赞成，认为这是影响因子游戏的积极意义。但它带来的严重弊端，许多人还没有认识到。

强调学者在高影响因子刊物发表文章，首先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现在很多学校、科研院所要求学者将论文发在高影响因子期刊上，而高影响因子刊物都在国外。换言之，就是把中国最优秀的学术成果送给《自然》和《科学》发表，因为他们的影响因子高，这样会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流失。

最后会形成中国科学家用中国纳税人的钱为外国打工的荒谬局面。科研经费是中国纳税人提供的，科学家把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杂志上，首先要向国外杂志提供版面费(有一项统计表明，现在仅这一项就每年数十亿元)；若国内同胞想要阅读这些成果，又需要再花一笔钱买回国外的杂志。

这样持续下去，我们中国学术期刊就永无出头之日，这会导致恶性循环。所以发展中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影响因子游戏进行反抗。

嘉宾对话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因子存在“引用联盟”等不端行为

孙周兴：江晓原教授的演讲让我很受启发，也感到一点儿安慰：看起来我们的学报、国内的期刊似乎比《自然》《科学》等杂志更规范、更规矩，比如我们学报上的文章必须通过匿名评审程序，最后由主编再审。

刚才江教授揭示了影响因子的商业性和游戏规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借鉴了国外影响因子评估原则，2000年左右，南京大学期刊评估中心开始进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评估，测评中文的人文社会科学期

刊，两年一评。我们学报 2006 年进入 CSSCI 目录，我认为最初的评价体系还是比较公正，因为当时影响因子是真实的，但后来有点儿变味。一些期刊开始通过建立引用同盟等手段来提高引用率。2013 年 1 月，我就发表主编新年致辞《大学学报不能给学术添乱》，反对影响因子造假。因为当时有人邀请我们参加这个游戏，联合起来相互引用来提高影响因子，但被我们拒绝了。

今年 1 月，CSSCI 目录中有 6 家学报新上榜、6 家学报被剔除，剔除学报中就包括《同济大学学报》和《武汉大学学报》。作为主编，我写了一个“声明”表示不满，此文情绪较大，被称为“嬉笑怒骂版”。

人文学科不存在进步与淘汰，抵抗普遍量化是它的尊严所在

孙周兴：经历此事后，我也开始反思。首先思维方式上，用评价自然科学的影响因子来评价人文科学是否妥当？影响因子的评估方法建立在科学的线性进步观念上，自然科学论文的引用旨在超越和淘汰，但在人文科学里很少有“淘汰”这个概念，所以也无所谓“进步”。我们无法认为现代人比柏拉图和老子思考得更智慧。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评价方法来评估人文科学。

其次，人文科学很难保持价值中立。各种价值因素会渗入人文科学中，政治、道德、伦理、宗教等，甚至个人性格、表达方式等因素，都可能对人文科学产生影响，而影响因子评估法却是以“价值中立”为前提的。

最后，人文科学能否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方式来评估？实际上从笛卡尔时代开始，西方就一直有反对计算和量化的声音。人文科学关乎人性和人世，而人性和人世的复杂性决定了所谓的人文“成果”不可被计算、被定量。往深处说，近代以来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争的焦点正在于“量化”。近代哲人维柯就开始忧虑：历史学的人文科学可以被数理化，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来研究和表达吗？狄尔泰用“理解”与“说明”来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试图以此区分来确立人文科学的自主性，维护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和尊严。在今天，“量化”更成为人文科学的最大魔障，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头号敌人。我现在依然认为，人文科学存在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抵制量化，抵抗技术给我

们带来的普遍量化，这也是人文科学的尊严所在。

如必须借鉴影响因子，数据、公式等应该更为透明

江晓原：国内做 CSSCI 评估几乎都是从加菲尔德那里学来的，他把评价自然科学的那套模式扩展到了社会科学，接着把艺术类，人文类的东西也加入进去，所以在他的思想里，这些东西也可以量化。

ISI 惩罚过刊物建立引用同盟，那几个互引杂志都被剔出 SCI 名单以示惩罚。虽然汤森路透年年都要在 JCR 报告上将影响因子的公式登一遍，号称公开，但是计算过程并不全部公开。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某种相对公平合理的评价手段，或者在后权威时代还不得不用影响因子这个手段的话，就应该更加透明公开一些。

但是这同样没有办法绝对公平，比如顶级刊物里有很多是《自然》的子刊，互相引用也没有见过被惩罚，子刊的关系比建立同盟的杂志之间还要亲近，甚至比你说的一个学校有两个杂志还要亲近。我们看见的是 ISI 压迫发展中国的杂志时这么做过，但是对《自然》系统的杂志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所以绝对的公正很难做到。

中国要建立起自己的期刊评价体系，影响因子的方法是可以参考的，在没有找到更好的体系之前也可以引用，但是要做到公正的话，应该比加菲尔德的私人公司更透明。

孙周兴：我想请教您，在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方式或评价体系方面有什么设想？

江晓原：其实我在很长时间里对 C 刊(CSSCI)是抱有希望的，它比较接近于中国人自己建立的一个体系，尽管原则和方法是从加菲尔德那里借鉴过来的。但是这次风波对它的声誉伤害很大，这次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在公布之前应该找出原因，到底是影响因子数据出现了问题，还是有人权力寻租？本来 C 刊在国内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但现在显然更加任重道远了。

正视学科的差异性，建立公平的中国期刊评价体系

孙周兴：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会议，讨论如何建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

术评估体系，有学者提出采用名家评价机制，我当时就想，这样会不会让名学者受累？因此确实是一道难题。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必须注意两点，其一，单纯通过影响因子来评价肯定有问题，如果一定要这样做，必须要有防范机制，避免影响因子造假。其二，学术评价里最关键的一点是正视学科差异，比如要区分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并且在相同的评价模式中用系数来加以平衡。我想这不算难事。

江晓原：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所有影响因子的弊端，包括引用同盟，在西方都已经出现过了。因此，不能对西方的评价体系过分推崇。很多事物都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妥协产物，如果最后我们探讨出一个中国行之有效的期刊评价体系，乃至论文、学者评价体系，相信肯定也是在各种兼顾和妥协基础上形成的。多种评价体系并存也是可以尝试的。现在是我们花更多时间和智慧来设想怎么建立新体系的时候了。

作者：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来源：《文汇报》2017年2月28日

二、学术训练有多狠？相互尖锐批评就是学者们合作的方式

在我曾经学习和任教的欧洲大学里，有一种十分重要的学术训练课程，即**论文讨论课**。课程形式十分简单：参与者基本是一个科研团队的全部成员，包括一个或几个教授、助理教授、博士研究生以及硕士研究生，人数大致15到20人左右。讨论课一般每周一次，每次讨论科研团队其中一人正在写作的论文。论文提交者提前一周将论文发到公共邮箱（为了不给大家增加太多负担，论文一般限定篇幅），大家事先阅读，然后在课上进行讨论。

所谓讨论，可总结为一个字：**喷**。

喷的对象，包括论文的理论内容，论证结构，作者呈现内容的方式、顺序乃至用语措辞。作为报告者，你所面临的，是众人加起来数倍于自己的智商和学识。你能够期望的，就是挺住，不被击毙，然后灰头土脸回去对论文进行全方位修改。

我个人读硕士期间，被教授训得最狠的一次，听到的原话是这样的：“就你这智商，想在我这里做论文？！”当然，**棒喝的目的不是致死，而是激励。**我最后当然还是以自己的智商勉强完成了硕士论文。在接受学术训练期间，遇到脾气不好的老师，挨训很正常。我的导师常说，**相互的尖锐的抨击就是学者们合作的方式。你是想在家里被同伴撕碎，还是想出去被别人笑话？**

在学术写作方面，我在这样的讨论课上获益匪浅。博士毕业前接受学术训练时如此，博士毕业后努力成为合格学者的时候，更是如此。

哲学理论方面的切磋，提高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是学术的核心，也自然是论文讨论课最重要的功能，这点没必要多谈。论文讨论课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强化写作技能。写好学术论文，是天底下最难的事情之一。任何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都极其复杂深邃。即使你最终想通了，有了某种创造性的理论，要将这个理论以一种简洁而适宜读者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理论越是复杂，相应的论文就越难写得具有可读性。**哲学思考是个人行为，哲学写作是社会行为。**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对社会化程度有极高的要求。在整个西方哲学的历史上，顶级哲学家的思想价值或许没有高下之分，但他们的社会化程度，绝对参差不齐。

坦率地说，对于相当一部分写作晦涩难懂的大哲学家而言，他们的文章拿到今天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绝对通不过初审。至于这种现象的存在，究竟意味着这些大哲学家们的写作方式错了，还是今天的体制错了，可以争议。或许大师们的确应该多体贴读者，而当今的学术期刊也应该多体谅作者。但无论争议结果如何，有个事实我们任何个人也无法改变：事实上，在看重研究的理论价值的同时，国际哲学界对哲学论文可读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再优秀的思想，一旦藏在失败的写作技巧后面，就很难得到认可。**对于没有丝毫名气的年轻人而言，更是如此。要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界，实际上处于一种超饱和状态。当下这个时间点正在从事职业哲学研究的人（以及等待研究职位的人）加起来，其数量远大于整个人类历史上相关学者的总数。

简而言之，竞争者太多，你的学术文字如果对读者不友好，就没有人理

睬你。论文讨论课近来在欧洲大学越来越受重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坦率地说，就学术论文的写作而言，欧洲的训练，普遍不如北美。但前者正在努力追赶。

论文讨论课最明显的功效，是**最大限度地并且最快地帮助作者获得相应的读者体验**。在阅读他人论文时，我们有什么阅读感受，我们自己很清楚。在写作自己的论文时，我们自己有什么写作感受，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但大多数糟糕作者之所以糟糕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清楚，**他们在特定写作感受的伴随下做出的论文，会给他人造成何种阅读感受**。其实，要体会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并不难。自己写的文章，放几天之后再读，往往觉得千疮百孔（当然，如果连这种体验都没有，那你就彻底没救了）。其原因不在于你的近日内学识陡增，而在于，几天之后，对文本的适度陌生化，让你具有了读者的眼光。

在论文讨论课上，作者面对十几个满腹牢骚的读者，他的写作给他人造成的任何不快，都会被立刻凸现出来。长此以往，讨论课的参与者对自己的文字，就有了一个比较客观严格的审查机制，渐渐能在写作的同时读出自己文章的好坏。这点绝对不容小觑。顺畅的学术写作是一种极难掌握的技能，而作者读者合一的境界，绝大多数人永远达不到。有了这种能力，他（她）至少在写作技巧方面，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了。并且，这种技能的运用范围，远远超出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

回到哲学内容上来。重要的话再说一遍：**相互的尖锐抨击就是学者们合作的方式**。有些东西，只有当自己的努力完成的作品在水平更高的同行眼中漏洞百出的时候，你才能学习到。只有当你遇到了比你更精细的思维，你才能意识到自己拼尽全力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有多么粗糙。在这种打击大量出现并且被逐渐消化之前，纯粹阅读量本身对学术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作用。如果你仅仅对哲学作品感兴趣，自己阅读就已经足够。但要获得哲学专业研究者的资格，论文讨论课这种形式，就是十分有帮助的。

同时，除了对个人的训练之外，论文讨论课也是学术共同体最直观的组

织形式。作为人文学科之一，哲学研究对于健康的学术共同体有着极强的依赖。离开健康的共同体，几乎完全没有没有客观的标准来评判哲学成果的好坏。

在绝大多数学者并不喜欢严谨深刻的哲学理论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客观的因素能凸显优秀研究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数学或其它自然科学对学术共同体的依赖相对较弱。数学有极为严格的推理规则，自然科学理论有经验后果。在自然科学史上，顶着同行的一片嘘声，靠过硬的经验观察而立足的理论，不在少数。

在这种意义上对共同体依赖最弱的，或许是体能竞技，包括斗殴。作为一种比较高下的活动，斗殴出奇地有效率。因为更强的人不需要事先说服弱者遵守某种游戏规则，才能击败对方。斗殴双方都被迫遵守物理力学法则。而人文学科里的高下之分，远远没有如此客观和直截了当。除非有健全的共同体，除非有公认的判断标准，否则，实际上的强者一败涂地，将会十分常见。

最后斗胆谈一点范围更大的题外话。任何学者，都有义务多少推动严格而且透明的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但有一点必须弄清楚：这种发展并不一定为任何个体带来福利。相对于不那么透明、资源分配不那么公平的环境而言，理想的学术环境总的来说并不会让更多的学术工作者生活得更好。

在公平或接近公平的学术竞争中，淘汰机制所考察的，是个体之间智力、天赋和勤奋的差异。这种机制和学术权势斗争，对个体而言究竟谁更残酷，很难评判。从某种角度来看，前者甚至更加残酷，因为它不给人抱怨的理由。欧洲和北美有大量中青年哲学工作者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靠着到处代课和申请少量研究经费经费度日，其中很多人已经在承担家庭责任。他们水平并不低劣，实际上其中许多人都可以出色地胜任教学和科研工作。问题在于，有比他们更出类拔萃的人。

当我们呼吁更好的学术体制的同时，必须预见到，我们中的任何个人以

及我们的学术后代，都不一定是在奔向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这个前景任然是值得追求的。或者说，如果它值得追求，那么就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赋予它这样的价值，虽然这个理由听起来高尚得近乎可笑：通过这样的炼狱，一个地区的整体学术水平，会有大幅度提高。

作者：蒋运鹏，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

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7年3月23日

三、游泳不只是游泳，体育不只是体育

进入校庆月，清华大学刚刚发布了106周年校庆的主题词“更好的清华等你来”和校庆期间一系列活动。对于广大在校生的校友来说，马约翰杯校运会怕是最受关注的活动之一。在校运会上，将发布各院系众多运动项目(含奥运项目和非奥运项目)的最终总成绩和排名，而今年又是马约翰杯校运会举办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提出——两个最能代表清华体育传统的特色活动和内在理念的60周年纪念。

最近坊间对于清华大学自2017年新生开始要求游泳达到一定标准方可毕业多有议论，褒贬不一，当属正常。作为一所公立大学，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对于自己要培养的人才标准提出相应的要求，本就属于自主决策的范围，清华大学既无树立标杆的初衷，更无将之推广到其他高校的权力。高等院校根据所处地理区域的气候特征和运动传统、体育设施和师资条件，选择并开展独具特色的运动项目，形成体育传统，这在国内和国际都早有先例。厦门大学当年开设爬树课，也曾引起各种议论；MIT曾经为了让学生加强运动，出台规定，要求每位学生都需通过游泳测试方能毕业，游泳测试是在十几米长的泳池里面游四个来回，不计时间；部分美国大学对体育成绩有硬性要求，比如一所背靠滑雪场的美国大学要求学生必须学会滑雪；地处中国东北的大学，亦有要求在冬季浇灌的操场冰场上学会滑冰，独立绕场一圈方为及格，如若体育课不及格，同样要和其他专业课程计入挂科科目

的统计之中。以上都是不同学校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的选择，不必也不能苛求一致。清华多年来所坚持的男生 3000 米女生 1500 米的跑步达标要求，也仅仅是学校对于人才培养的一种选择而已。不必千校一面，不只游泳，不必非是游泳，才是更自然的状态，才是更丰富的世界。

从游泳引发的讨论，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体育项目的达标与毕业条件关联就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似乎在高等数学不及格不能毕业、英语四级不达标不能毕业这些与学业相关的标准出台实行时却未曾见过，究其根源，是否还是来自于自身对体育的价值认知和判断呢？马约翰先生在《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中其实说的很清楚，动是生命与健康的源泉；体育是培养人们具有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只限于运动场上，且能影响整个社会。在刚刚出版的《体育简史》一书中，托尼·柯林斯在追溯 300 多年体育发展的历史后也总结到，体育是在帮助人们达至精神和身体极限的可能性与过程。“育”很关键，developmental 就是个过程。体育强调规则，强调竞争，也强调合作，有胜利的荣耀和突破的成就，也有失败痛苦和瓶颈的纠结。通过运动项目的技能学习和规则掌握，通过运动习惯的养成，“育”就在发生，不仅仅是身体，亦是心理人格的塑造，亦是价值观的明晰和强化。再回到新规本身，游泳达标不是清华大学录取的入门资格，但是希望通过在清华的学习，没有特殊情况的学生可以学会这项运动技能，这也是一个 developmental 的过程。

清华大学的体育传统，亦是代代清华人的青春回忆和校园文化的标志。如今清华大学的毕业长跑必要穿过二校门而出，与耶鲁大学校园那位校长雕塑的鞋子被摸得锃亮，与将要举行的牛津剑桥持续百年的赛艇对抗赛一样，都是每个大学对于自己要塑造的文化导向和价值判断的一种传播形式。

更好的清华等你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自己，也会让你选择什么样的校园！

来源：人民网 2017 年 4 月 1 日